

烟台故事

# 榆山后那些无名英烈

林新忠

一

和风煦煦，掠过河滩，栖霞市榆山后村下河西岸的那片果园，在春风里洋溢着春草萌发的淡淡清香。谁能想到，这片孕育着丰收的土地之下，却沉睡着多位无名抗日烈士。五十载光阴流转，儿时跟着老师来此扫墓的画面，依旧清晰如昨。那些牺牲在故乡土地上的英勇战士，未曾留下姓名，未曾被党史军史记载，他们的忠魂，却始终萦绕在榆山后的田野山川，让人世代铭记。

总想为这些无名英雄做点什么，让他们的故事被世人知晓，让英魂得以安眠。正月初一，与父亲谈及此愿，父亲说：“走，我和你一起去找你二伯唐义山！”二伯已是93岁高龄，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，谈及那些牺牲的烈士，老人的目光变得凝重，那些尘封在记忆里的战斗往事，便在他的讲述中，渐渐清晰起来。

二

那是1943年的春天，胶东大地仍笼罩在日伪的阴霾之下，榆山后这个宁静的小村庄，也像栖霞所有的村子一样被卷入了战争的洪流。一个夜晚，五百余名八路军战士悄无声息地进驻村里，村长唐发山挨家挨户安排住处，八十多户人家，四五百口子，以最朴素的方式接纳了这支队伍。没人能说清他们从哪里来，属于哪支队伍，有人说是转移的被服厂工人，有人说是干部培训班的学员。队伍里有两百多名妇女，带着不太多的驮子，满身风尘，却难掩面颊的坚毅。从衣着穿戴和人员构成等方面猜测他们并非前线作战部队。头天半夜进村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部队便在前河支起铁锅做饭，金黄的玉米饼子刚出锅，还没等战士们吃上一口饭，村里外出打探消息的青年民兵姜义海便匆匆跑回村，带来了令人心惊的消息：花地沟泉眼处发现了日本兵，驻扎在海阳求格村的日伪军，正朝着榆山后进发。

“花地沟泉眼”离村不过三四公里，军情紧急，容不得半点迟疑。战士们紧急集合，一人揣一个饼子、一根大葱，匆匆向东撤离，大部队的马蹄声登上村东塘，沿着“栗蓬沟”往东方急行。队伍刚到“烂石叉”垭顶山口子的平滩，离“黑神庵”口子还有几步之遥，身后的榆山后便传来了动静——日伪军已然进村，几百人的队伍里，有鬼子，有伪军，还有被强征赶牲口的壮丁，他们似乎消息灵通，进村后未作停留，循着部队的踪迹紧紧追来。

山路崎岖，大部队的马蹄声越来越近，离“黑神庵”不远的小榆山成了唯一的屏障。那里满是碾子石，山顶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石碾，是阻击敌人的绝佳位置。危急关头，部队首长做出了一个别无选择的悲壮决定：留下一个班，阻击敌人，掩护大部队的撤离。

三

十二名年轻的战士，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。望着大部队远去的背影，战士们转身投入战斗。他们一个个握紧钢枪，攥紧手榴弹，趴伏在小榆山顶大石碾之后，目光炯炯地盯着敌人。转眼工夫，日伪军已经靠近。“叭叭”几声枪响，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。鬼子骑着高头大马，气势汹汹地扑向小榆山，一场惨烈的阻击战打响了。枪声在山谷间回荡，喊杀声、马蹄声、枪炮声交织在一起，十二名战士以寡敌众，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。

枪声过后，硝烟散尽，村民们回到村里，才知道那场战斗的惨烈。十二名战士，无一生还，全部壮烈牺牲。有人说，战斗打响时，大部队才刚行至前边的贾家沟村，不过三四里的距离，这短短几里路，是十二名战士用生命换来的生机。有人说，这场阻击战的失利，是因为鬼子骑马绕到了战士们的身后，形成了前后包抄，前方有机枪扫射，后方有小炮轰击，战士们腹背受敌，退路被彻底斩断。附近村庄的群众自发来到小榆山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泪流满面：战士们的遗体散落在石碾之间，有的刚咽下的饼子，被枪弹打了出来，还有一位战士，倒在离战斗地点几百米远的“桥子石”边上，他一定是在战斗中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。

四

榆山后、帽江家、贾家沟三个村的干部群众，含泪将烈士的遗体抬回，其中多位烈士被安葬在榆山后下河西岸的土地上，没有墓碑，没有墓志铭，只有一抔黄土，默默守护着这些无名英雄。他们是谁的儿子，是谁的丈夫，是谁的父亲？无人知晓。他们从哪里来，有着怎样的过往？无人知晓。唯一能确定的，是他们为了守护家国，为了掩护战友，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之上。

《中共栖霞地方史》关于1943年记载为：1月，日伪“扫荡”部队经过连家庄，被民兵诱进雷区，炸死三名日军。这也说明，1943年日伪军仍在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疯狂“扫荡”，可与榆山后那场战斗背景相吻合。到了1943年秋冬，抗日形势开始好转，年底时日军对胶东的封锁便被彻底打破，1944年底，栖霞城宣告解放。

河岸边的那片无碑墓地，早已被开垦成了果园，果树成林，硕果满枝，只有脚下的土地，依旧守护着那些沉睡的英魂。他们生前，用生命和鲜血保家卫国，在枪林弹雨中挺身而出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；他们死后，化作一抔土，滋养着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。后来人不会忘记，榆山后不会忘记，他们的故事，将在乡野间代代相传，他们的忠魂，将在河畔永存。

# 刘胡兰式的烈士李培真

于建章

在福山城北的盐场村，有一名刘胡兰式的烈士李培真，她曾任福山县妇救会会长，积极投身革命，年仅30岁时就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了。

一

李培真1913年出生在村里一个富裕家庭，自幼聪明、豪爽，对穷人充满同情心，经常偷拿家里的点心、糖果，分给穷人家里的孩子。14岁在北关小学读书时，她受到了新民主思想的启迪，带头穿旗袍、留短发、放小脚，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她组织学生参与抗日救亡运动。由于她威望高，每次游行示威都起到带头作用。在人群聚集的时候，她便登高发表抗日演说。

卢沟桥事变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福山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。李培真也参加了福山“民先”成立的业余救亡歌舞团，每逢集日，她就和剧团人员一起到大集上演出。1939年，她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——“民先”，在堂兄李培庆的影响下，于1940年春被时任福山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历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被党组织派往厚滋沟小学任教，化名于敏。

二

1941年3月，胶东反投降战役后，福山县委县政府公开，于敏出任县妇救会会长。她大力积极培养骨干分子，开办了根据地妇女学习班，开展拥军优属活动，带领县机关的妇女干部开荒种地，响应“自力更生、丰衣足食”号召。这期间，于敏还代表组织到五区的北皂村，筹划成立了福山县第一个妇女党支部——北皂村党支部（因支部委员全是女同志）。在工作中，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县“各教会”秘书杨蔼堂，结为伉俪。

1941年5月，国民党顽固派陈昱带领残部从莱阳窜至福山，在恶劣危险的斗争环境下，于敏主动要求到敌占区开展工作。她装扮成走亲戚的农妇，来到儒林沟的外祖母家，以各种机会与贫苦农民接触，团结教育他们抗日保家园，反对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。

一天，一个排的伪军押着儒林沟等三个村的农民往县城给日军送粮。刚走不远，就听到“噼里啪啦”的枪声和爆炸声，还听到有人喊“八路打来了”，伪军吓蒙了头，丢下粮食就逃回县城。这次虎口夺粮，是于敏在得知伪军送粮的情报后，带领十几个村的民兵配合区中队，用土枪、十几枚手榴弹和十几挂放在水桶里的鞭炮，吓跑了40多个全副武装的伪军，夺回粮食万余斤。

1942年秋，于敏在狮子山区茂芝场生下一个女孩，她把不满月的孩子寄养在茂芝场妇救会会长家里。此时日伪军正在实施对磁山、艾山山的“拉网合围大扫荡”，陈昱的特务队也伺机活动在磁东的村庄田间，偷窥我党的活动情况和共产党员分布情况。于敏不畏艰险困苦，带领同志们辗转工作在吕家沟、黄泥沟、大转村等12个村，并在各个村都成立了民兵抗日小队。

三

1943年1月24日夜，于敏冒雪从黄泥沟出发到吕家沟村召开第三组的工作会议。刚出村，她就发现身后有“尾巴”，不得已，她只能凭着对地形的熟悉，绕道50多里，第二天早晨才到达吕家沟。会议结束后，同志们都离开了，她则留下一男一女两名业务骨干，共同研究布置下一步的对敌斗争计划。下午2点左右，忽然喊声四起，枪声大作，于敏马上意识到是国民党顽固派陈昱的人马来了。她认为自己产后身体虚弱，还患有乳腺炎，如果与同志们在一起，一定会连累大家。她果断命令分散突围，让另两名同志围上头巾、挎着篮子扮作村民，立即出村，于敏自己躲在一个草垛里，后不幸被敌人搜出。

国民党福山县保安团司令陈昱获知共产党的县妇救会会长被俘，非常高兴，亲自制定审讯方案，以为这下子一定可以获得共产党的情报，邀功请赏。25日早晨，于敏被带往大王家祠堂，到了门口，于敏用手挠了挠头发，整了整衣襟，从容不迫地跨过门槛走进祠堂。这时一个50多岁、身材矮胖的男子迎上前来，虚伪地说：“本人姓陈，名昱，属下有冒犯之处，请多多包涵！”说完，把于敏引到旁边一间干净的小房间里，倒了一杯开水、摆上果盘和点心，随后拿出一张白纸，妄图诱导于敏投降，让她声明脱离共产党。陈昱话音刚落，于敏就把眼前的白纸撕个粉碎，扔到了陈昱的脸上。看到于敏如此坚贞不屈，陈昱就把于敏押到门楼、望远等日伪控制的地区游街示众。当晚，于敏被押回祠堂受审，在遭受敌人的皮鞭抽打、浑身伤痕累累的情况下，敌人逼问她脱不脱离共产党，于敏大义凛然地答道：“我既然加入了共产党，就永远是党的人！”两个匪徒穷凶极恶地把她扑倒在地，用钢锥猛扎她的身体。于敏一声惨叫，昏死过去。

1月29日深夜，于敏被押解到牟城吴家的一处山坡上，与邹瑞云等几名革命同志一起英勇就义。在后来的福山革命史志中，一直称于敏为“刘胡兰式的著名烈士”。